

供需之间：贵州山区农村养老服务的村级供给与个体需求匹配性研究

——基于H县M村的田野调查

刘 爱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3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31日

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及未来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深、应对能力弱的问题尤为突出。已有研究多从宏观政策或机构养老角度讨论农村养老问题，对偏远山区村级养老服务供给与个体需求之间匹配关系的微观研究仍然不足。本研究以贵州省赫章县M村为田野点，通过村级问卷、15份农户问卷及深度访谈，考察偏远山区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需求”匹配问题。研究发现：在公共养老设施基本“空白”的背景下，村级供给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老年人个体需求呈现清晰的年龄分层特征，且存在显著的需求表达隐匿性；供需之间在总量、结构、空间、认知四个维度均存在显著错位。在“结构-能动性”框架下审视，错位的根源在于宏观制度设计、村级组织能力、个体应对策略与文化观念之间形成了“供给不足 → 需求隐匿 → 制度性忽视 → 供给进一步萎缩”的再生产循环。改善偏远山区农村养老服务，需超越“设施建设”的单一路径，探索“家庭为本、社区为基、政策托底”的精准化供给模式。

关键词

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匹配，偏远山区，结构-能动性，需求隐匿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 Study on the Matching of Village-Level Provision and Individual Needs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Guizhou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in M Village, H County

Ai Liu

文章引用：刘爱. 供需之间：贵州山区农村养老服务的村级供给与个体需求匹配性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603-610. DOI: 10.12677/ar.2026.137498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fundamental national condition China faces, with rural areas experiencing more severe aging yet weaker coping capacity. Most studies discuss rural elderly care from macro-policy or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while micro-level research on the supply-demand matching in remote mountainous villages remains insufficient. Based on fieldwork in M Village, Hezh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using village questionnaires, 15 household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finds that against a near-total void in public care facilities, village-level provision is “willing but unable”; elderly individuals’ needs display clear age stratification and significant concealment of need expression; and supply-demand mismatches exist across four dimensions: quantity, structure, space, and cognition. Viewed through a “structure-agency” framework, these mismatches stem from a reproductive cycle of “insufficient supply → concealed demand → institutional neglect → further supply shrinkage.” Improving elderly care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requires moving beyond “facility construction” toward a precision supply model that is “family-based, community-grounded, and policy-underpinned.”

Keywords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Structure-Agency, Hidden Need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及未来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万人，其中 65 岁以上人口 22,365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1307 万人和 342 万人[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 23.81%，比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点[2]。在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的背景下，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

农村养老服务的核心矛盾在于政策供给与老年人实际需求之间的错位[3]。尽管国家已大力推进农村互助养老设施建设，但在偏远山区，政策设计的“最后一公里”面临基础设施薄弱、服务半径过长、专业人力匮乏等现实制约。魏凯霞指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分散分布于各部门，条块管理导致资源难以有效整合[4]。贵州省赫章县作为原深度贫困地区，其养老服务困境在偏远山区农村中具有典型性。2025~2026 年，贵州省相继出台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和互助养老试点方案[5]，但宏观政策在微观村域层面的实际落地效果，仍有待基于田野调查的深入检视。

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2.1. 问题的提出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政策设计与机构养老模式，对偏远山区农村微观个案的深描研究相对不足。

已有学者揭示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多重不确定性风险”，即家庭照护不足、公共服务协同弱化与资源支持体系不稳定[5]，但对于政策供给与个体需求在村庄场域内具体的匹配机制、错位形态及其社会文化根源，缺乏深入的实证剖析。“最后一公里”治理视角指出，政策资源在从中央到村庄的传递过程中存在逐级衰减效应，越是偏远基层，政策落地越依赖村干部的个人能力与村庄社会资本[6]，但这一视角尚未被充分引入农村养老服务研究。由于我国家庭养老的主流地位，社区居家养老比机构养老更容易被广大老年人接受[7]。在城市，已建立相对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而在边远的山村，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存在何种需求，又如何结合社区资源进行协调，需要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公共养老设施基本“空白”的偏远山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如何被满足？村级供给与个体需求之间存在怎样的匹配或错位？这些错位背后的制度、组织与文化根源是什么？

2.2. 研究方法田野点概况

本研究以贵州省赫章县朱明乡 M 村为田野点。M 村下辖 6 个村民组，户籍人口约 1200 人，常住人口不足 600 人。村内无集体经济产业，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9800 元(2024 年数据)。通组道路虽已硬化，但无公共交通，最远散居户步行至村委会超过一小时。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 35%以上，村内无专门养老设施，村卫生室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机构。选择 M 村基于以下典型性标准：地理区位的边缘性、老龄化与空心化的交叠性、政策介入的临界性——赫章县已启动互助养老试点，但 M 村尚未实际受益。本研究结论可外推至同类型“设施空白型”偏远山区农村。

研究采用立意抽样，对村支书进行村级问卷访谈，据此选取不同年龄段、家庭状况及村民小组的老年人，完成 15 份农户问卷与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抽样遵循最大变异策略，在年龄、居住安排、失能状况三个维度上尽可能多样化。最终样本分布为：低龄 8 人、中龄 5 人、高龄 2 人，覆盖全部 6 个村民组；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者 9 人，与子女同住者 6 人；有慢性病史者 11 人，其中不同程度失能者 2 人。当访谈到第 13 人时，需求类型与表达模式开始明显重复，后续 2 份访谈未提供新的主题类别，判断已达到信息饱和，故终止抽样。每例访谈时长 30~60 分钟，征得同意后录音并转录。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

理论视角上，本研究借鉴“地方性知识”视角解读需求表达的隐性及其文化逻辑，运用“互惠与交换”理论分析邻里互助传统的运作机制，以“结构-能动性”框架贯穿全文，揭示制度性供给的结构性约束与个体及村级组织的适应性行动之间的张力。

3. M 村养老服务供给现状分析

M 村村级养老服务设施处于基本“真空”状态：无农村幸福院、老年活动室、日间照料中心或养老供养床位。村卫生室仅提供基础诊疗与慢性病随访。生活照料类服务完全缺失，文体娱乐类服务近三年未组织过任何针对老年人的集体活动。供给以亲属邻里零星帮扶为主。M 村无专职养老护理人员，养老服务工作依靠村干部兼职应对，资金来源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从政策落实的具体形态来看，高龄津贴等资金类项目能够按时足额发放；照护服务类项目则受资金和人力条件制约，目前尚难以覆盖。

需指出的是，M 村并非对特殊困难老人完全“看不见、管不着”。村内建有特殊群体的详细台账并安排专人定期走访，但因村干部行政事务超载，走访在部分时段被压缩或流于形式。这表明供给困境不仅是资源真空，更是“有人但无暇尽其责”的组织超载。在非正式照料层面，高龄老人多数有留守子女或近邻提供日常关照；村医是当前信任存量最高、物理距离最近的服务供给者，可处理基础性疾病并组织健康体检，但其服务能力仅覆盖健康支持链条的最前端。

4. 农村老年人个体养老服务需求特征分析

4.1. 需求的年龄分层与梯度转移

M 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呈现清晰的年龄分层，随年龄增长发生从文体娱乐、医疗康复到长期照护的梯度转移。低龄老人(60~69 岁)多数仍在从事农业生产或打零工，需求以文体娱乐和社会参与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低龄老人普遍通过手机微信视频和短视频获取娱乐内容，智能手机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村内文体活动的真空，但这种“数字化消遣”也进一步削弱了对集体活动的需求表达；中龄老人(70~79 岁)均有慢性病史，需求重心转向医疗康复。该群体对生活照料已存在潜在需求，但访谈中普遍表现出“羞于启齿”的态度；高龄老人(80~89 岁)自理能力严重下降，需求重心转移至长期照护与精神关爱。

除分层需求外，M 村老年人还普遍存在因交通不便与公共服务缺位产生的基础生活支持缺口。买药和购买日常用品依赖赶集，但老人出行不便；太阳能热水器虽已较普及，但浴室缺乏防滑扶手等适老化设施，冬季洗浴存在安全隐患。需求的重点正从“热水”转向“安全洗浴环境”。

4.2. 需求表达的隐匿性机制

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审视，M 村老年人对“养老靠外人丢面子”的坚守并非简单的观念落后，而是当地社会评价体系内化后的理性表达[7]，在熟人社会半封闭的道德共同体中，“不给子女留话柄”关乎整个家庭的象征资本，其权重远高于个体舒适度的提升。由此，不表达需求便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合理”的选择。尽管各年龄段老年人均存在养老服务需求，但需求表达呈现显著的隐匿性，其成因可从文化、认知、经济、信任及技术五个机制加以解释。

文化机制层面，“养老靠外人丢面子”的观念根深蒂固。受访者 M07 (男，72 岁)说：“有儿有女的，叫别人来伺候，村里人要说闲话的。”老年人坚定认为养老是家庭的责任，子女承担照料是展示家庭伦理成果的象征，同时“不给国家添麻烦”被视作尊严底线。但这一立场并未导向对国家责任的否定：老年人普遍感恩养老金和高龄津贴，同时表达了“能多一点当然更好”的期待，且更倾向实物物资折合现金自行支配。认知机制层面，信息闭塞导致需求表达的第一通路被阻断。15 名受访者中 12 人表示“不知道政府还有什么政策”。经济机制层面，老年人默认服务需高额付费而主动压制需求，受访者 M11 (男，76 岁)说：“请人照顾那是城里人的事，我们哪里请得起。”信任机制层面，个别老年人拒绝村干部入户，“觉得他们在做样子”，而与之对照的是对村医的普遍信任，这种差异提示服务者的身份角色与既往信誉对入户可接受性的关键影响。技术机制层面，低龄老人能操作微信视频但复杂应用无力，高龄老人仅限打电话，数字能力缺失使线上服务渠道在实际上面临“看得见但不会办”的困境。

五重机制的叠加使需求隐匿成为 M 村养老秩序的组成部分：文化赋予“不求助”以道德正当性，信息盲区使选项不可见，经济预设消解预期，信任壁垒阻断路径，技术门槛窄化渠道。当需求不被看见，供给的空白便被默认合理。

5. 供需错位的形态与再生产机制

将村级供给现状(第 3 部分)与个体需求特征(第 4 部分)进行匹配分析，可发现 M 村养老服务供需之间并非简单的“供给不足”，而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错位。更关键的问题是：这种错位何以长期存在而不被纠正？本部分先呈现错位的四重面向，继而借助“结构-能动性”框架分析其再生产机制。

5.1. 供需匹配的多维错位表现

M 村养老服务供需之间存在显著的总量错位、结构错位、空间错位与认知错位(见表 1)。

Table 1. Supply-demand mismatch matrix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M village
表 1. M 村养老服务供需错位矩阵

需求类型	村级供给	匹配程度	错位表现
文体娱乐	基本无	极低	低龄老人需求强烈，但无活动场所与组织
医疗康复	仅村卫生室	较低	中高龄老人需求大，但服务能力与覆盖面有限
生活照料	无	无	家庭照料压力大，无任何社会化支持
精神关爱	无	无	高龄老人情感需求被完全忽视
长期照护	无	无	失能老人照护完全依赖家庭，无公共供给

总量错位表现为供给空白与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结构错位体现为政策供给以“资金发放”为主而需求以“实体服务”为主；空间错位源于服务资源集中于乡镇层级，老年人受限于山路与衰弱的身体，最远住户步行至村委会超一小时，“建在那里的东西，跟我们没多大关系”；认知错位则表现为政策考核偏好设施建设，而老年人期待“服务进家门”。

5.2. 结构性约束：制度设计如何制造错位

总量错位和结构错位本质上源于宏观制度安排对偏远山区的系统性不利。在“城乡统筹”的政策框架下，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从县乡向村庄逐级递减的梯度特征，偏远村庄处于服务递送链条的远端。杜鹏，罗叶圣揭示的农村一般被视为养老服务的“边缘市场”[8]，在 M 村表现为：县域层面已有养老护理员培训，搬迁社区金银山街道已建成老年活动中心，但这些资源与 M 村老年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地理与制度距离。政策执行的链条过长且缺乏逐级适配的差异化机制，是错位得以存续的深层原因。从中央到省到县到村，资金和人力逐级递减，到村级时只剩“执行任务”的要求，却没有配套的资源 and 权限。在 M 村，高龄津贴可以按时发放，因为它只需“核对名单 - 发放资金”；照护服务无法提供，因为它需要“有人 - 有时间 - 有技能 - 有资金”，四项条件村级无一具备。

更隐蔽的结构性偏向在于，当前养老服务绩效考核倾向于考核设施覆盖率与床位数，以设施覆盖率为导向的考核方式，在地广人稀的偏远山区面临投入产出比低、适用性不足的困境，而资源配置尚未充分转向服务递送，构成了结构错位的一项重要背景。陆杰华、林嘉琪所指的“重资金补助、轻服务递送”偏向[9]，在此不仅是政策偏好问题，也反映出考核体系与偏远山区地理条件之间的适配难度较高。此外，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的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如线上申请、远程问诊平台等)，在 M 村面临与地理分散同等程度的限制。这一错位进一步表明：标准化服务供给模式在人口密度较低、居住分散的偏远山区，面临较高的适配成本。

5.3. 能动性的限度：组织与个体的应对为何无法破局

面对结构性约束，村级组织和老年人家庭并非完全被动，但既有能动策略均停留在“维持”层面，无法从根本上突破困境。

在村级组织运行层面，村干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上级部署的常规工作任务。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台账管理和定期走访虽已形成制度，但受日常行政事务影响，执行频次和深度存在波动。这表明，在任务传导与需求回应之间，村级组织的精力分配更多倾向前者，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面临结构性制约。此外，调研中观察到，个别村干部上门走访时，有老年人未开门，仅隔着门表示“没事”。正式服务与老年人实际接受之间，不仅存在资源缺口，还受信任程度和服务适配性的影响——如何使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愿意接受帮助，是服务递送中同样需要关注的问题。

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能动策略可概括为三条路径。其一是“代际分工下的自我养老”：低龄老人尽可能自我维持并分担子女负担，中高龄老人依赖配偶照料，直至失能才紧急求助外出子女。这一策略将照护压力在家庭内部逐级延迟而非消解，最终积累为照护危机[6]。其二是“邻里非正式互助”：M村保留着农忙换工、红白喜事帮工的传统，然而，该模式的服务质量难以保障，持续性和覆盖性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易受个体意愿变化或关系网络弱化的影响[10]。受访者 M05 (女, 68 岁)说：“邻居也会帮忙带点东西，但人家也有自己的事，不好总麻烦。”这份人情的分量对求助的老人和帮忙的邻里都不轻松。

从互惠理论的角度看，M村的邻里互助属于“一般互惠”，即助人者隐含着“他日我需时也会有人相助”的长期期待。但在常住人口锐减、低龄老人自身亦面临照料压力的背景下，这一期待的兑现概率不断走低。当可能性链条断裂，“一般互惠”便向“平衡互惠”收缩：受访跑车师傅“偶尔帮一次可以，总叫人带，人家也不愿意”的表态，正是质变的信号。其三是“需求自我压缩”：老年人通过降低期待来适应供给空白，“不给子女添麻烦”成为反复出现的表述。这一策略可被概念化为“适应性偏好形成”。当个体长期暴露于资源匮乏环境中，会通过下调期待消解认知失调，使“没有”变得“可以接受”。由此，结构性约束不再仅作为外部条件而存在，而是被个体内化为自身的偏好结构，能动性在此处表现为一种“自我约束”而非“积极改变”的形态。这些策略的共性在于，它们只能在既有秩序内“消化问题”，无法向制度系统“反馈问题”，需求隐匿的客观效应，是使政策系统持续接收“不需要”的假信号。

认知错位由此获得自我强化的动力。政策制定者观察到的表象是：农村老年人似乎不太需要专业服务，家庭和邻里网络似乎还能维系基本秩序。但这一判断遗漏了第4.2节揭示的隐匿性机制：不是“不需要”，而是“不表达”。表象的“需求不足”为供给空白提供了事后的合理化辩护，使制度性忽视得以延续。

5.4. 结构 - 能动互构：错位的再生产循环

将上述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限度放在一起审视，一个“缺乏外力便难以打破”的再生产循环逐渐清晰。资源配置的梯度递减特征 → 村级养老服务资源相对不足 → 老年人及其家庭发展出自我调适策略 → 需求表达隐匿，假性“需求不足”信号上传 → 政策系统误判为“需求不迫切” → 资源配置继续向城镇倾斜，村级供给维持空白 → 家庭再度被迫自我消化，策略趋向保守 → 循环加固。

在这一循环中，结构性约束与个体能动策略相互形塑：策略的保守性并非天性使然，而是结构性约束长期作用的结果；而结构性约束的持续，又因需求端的“安静”而缺乏被打破的压力。经济条件的极低水平构成这一循环的“底板”。当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9800元，任何市场化或部分自费的养老服务方案都面临不可逾越的支付能力壁垒。而“养老靠自家”的传统观念，则在文化层面使这一循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价值认同，使外部服务在嵌入时既面临供给不足的客观约束，也面临需求端接受意愿的主观屏障。

循环的突破点在于，必须有一个外生力量，如政策创新或资源注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供给侧须提供可及的服务，让隐匿的需求“看得到希望”；需求侧须建立表达渠道，让真实的需求“被系统听见”。单侧施策必然被循环的力量所抵消。

6. 破解策略与政策建议

6.1. 探索“服务上门”的精准供给模式

建议在偏远山区优先发展“服务上门”的流动供给模式。M村调研显示，村医是当前最被信任的入户服务提供者，流动服务队应以村医为骨干，赋予“基础健康监测 + 代购代办联络 + 需求信息收集”的复合功能，利用既有信任存量降低入户门槛。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避免因任务叠加而流于形式，需将

上门服务纳入专项考核并给予适当补贴。试点初期可从“代购代办”等低门槛、高需求项目切入，积累信任后逐步扩展。

6.2. 激活低龄互助的组织化网络

针对非正式互助的脆弱性，建议建立“互助积分”制度[11]，以服务时长或频次计量，积分可兑换未来优先服务权或小额实物奖励，通过村务公开平台定期公示确保公信力[12]。依托“行政村－自然小组－邻里”三级网络搭建互助架构，互助服务限定于基础生活协助，由村卫生室提供定期照护指导。可申请贵州省互助养老试点政策，将闲置空间改造为互助服务站点，以最小成本启动。

6.3. 为家庭照料提供便捷有效的支持

有研究显示，近 10 年来我国老年人对照料责任的认知整体呈现向家庭内部转移的趋势。在明确家庭养老照料基础性责任的同时，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照料模式，健全以减轻家庭负担为导向的照料支持体系[13]。应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免费护理技能培训和“喘息服务”。如探索适配版“家庭养老床位”，通过床边扶手、防滑垫、沐浴椅等简易适老化改造将专业照护指导延伸至家庭，可率先从 M 村需求突出的居家洗浴安全入手，通过差异化补贴减轻低收入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6.4. 建立“需求表达”的有效渠道

赋予县级以上政府更大政策自主空间，允许将设施建设资金转为购买上门服务。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资源下沉机制。考虑到 M 村老年人数字能力的年龄断层，服务信息发布不宜过度依赖线上渠道，应在流动服务队功能中增设“数字辅助”职能，同时保留线下公告和口头告知方式，确保高龄老人不被排除。

6.5. 重塑养老文化

在尊重传统家庭养老合理性的同时，引导构建新型互助文化。M 村老年人对“养老靠国家”的拒绝和对家庭责任的坚守，提示政策介入的合法性框架应从“替代”转向“支持”。将“邻里相帮”“孝亲敬老”的传统价值与现代服务理念相融合，通过组织集体生日会、老年协会等低成本活动，重建老年人的社会联结。在宣传上弱化“养老靠外人”的被动接受感，强化“大家帮一把”的共同体意识，逐步消解“求助即丢面子”的文化压力。

7. 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贵州省赫章县 M 村的田野调查，揭示了偏远山区农村养老服务的供需错位图景。研究发现：1) 村级供给处于“有心无力”困境，虽有台账管理和定期走访安排，但组织超载使执行大打折扣；2) 老年人需求具有清晰的年龄分层与梯度转移特征，且存在显著的基础生活支持缺口；3) 需求表达因文化、认知、经济、信任、技术五重机制的叠加而呈隐性；4) 供需之间在总量、结构、空间、认知四维度均存在显著错位。在“结构－能动性”框架下审视，这一困境本质上是结构性约束与个体需求隐匿相互形塑的再生产循环。改善此类地区养老服务，需超越单一的“设施建设”路径依赖，探索“家庭为本、社区为基、政策托底”的精准化供给模式。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样本量有限，为一次性田野调查无法追踪动态变化，结论主要适用于“设施空白型”偏远山区农村。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进行多类型村庄的比较研究，并采用追踪方法分析服务供给介入后的供需匹配变化。

参考文献

- [1] 王萍萍: 2025 年全国人口总量为 140489 万人 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2026-01-19.
- [2]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 [3] 覃婷婷. 数字鸿沟视域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困境及协同治理策略[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5, 36(24): 184-186.
- [4] 魏凯霞.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路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湘潭: 湘潭大学, 2020.
- [5] 贵州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试点工作方案[EB/OL].
<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9801/content.html>, 2026-06-30.
- [6] 王瑜, 程令伟.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与养老模式变迁[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2, 15(4): 115-120.
- [7] 郑吉友.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体系构建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9(6): 73-79.
- [8] 杜鹏, 罗叶圣. “十五五”时期中国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挑战和路径[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10): 19-30.
- [9] 陆杰华, 林嘉琪. 重度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特征、风险识别与战略应对[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3(1): 59-68.
- [10] 李根, 李腾飞. 不确定性共担: 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逻辑及其类型化研究[J]. 人口与社会, 2025, 41(5): 30-40.
- [11] 刘妮娜. 互助与合作: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研究[J]. 人口研究, 2017, 41(4): 72-81.
- [12] 吴金兴, 祝哲. 农村互助养老院项目何以成功: 基于 A 村案例的制度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4(4): 150-159.
- [13] 张文娟, 张硕. 中国老年人的照料责任认知转移及其趋势研究[J]. 人口学刊, 2026, 48(2): 68-84.